

史书不见毛延寿

□ 霜枫酒红

昭君出塞的故事传颂久远,湖北、陕西、山西、内蒙古等地还多有相关研究社团、组织。很多人的研究中会涉及到一个角色画师毛延寿——因为他,王昭君和汉元帝失之交臂;因为他,王昭君和亲远嫁匈奴。很显然,在昭君出塞的艺术叙事中,毛延寿扮演了一个影响人物命运转折的角色。

对于画师毛延寿的关注古已有之,而且成为昭君题材文学创作的一大类。目前可见,东晋葛洪《西京杂记·画工弃市》中最早出现“画师丑化王昭君”情节。文中描述汉元帝命令画师画好后宫佳丽的肖像供他挑选。为了博取帝王宠爱,许多宫女妃嫔通过贿赂画师来表现自己最美的一面。唯独王昭君不肯通过行贿的方式博取机会,画师毛延寿故意将其丑化,导致她未能引起元帝的重视。

《西京杂记》是一部历史笔记小说集,记录了西汉时期上至庙堂下及民间的诸多社会生活,内容涉及政治、文学、科学、哲学诸多领域,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参考价值。葛洪用早期小说的方式描摹王昭君被画师丑化的故事,“元帝后宫颇多,不得常见,乃使画工图形,按图招幸。宫人皆赂画工,昭君自恃貌美,独不肯与。画工乃丑图之,遂不得见”。

《画工弃市》所记并无正史来源,但对后世昭君文学的创作影响极大,毛延寿最终成为被人唾骂的千古罪人。唐元和十二年(817),46岁的白居易创作了七言律诗《昭君怨》,“明妃风貌最娉婷,合在椒房应四星。只得当年备宫掖,何曾专夜奉帷屏。见疏从道迷图画,知屈那教配虏庭。自是君恩薄如纸,不须一向恨丹青。”唐代崔国辅作《王昭君》,“何时得见汉朝使,为妾传书斩画师。”

北宋欧阳修曾作《明妃曲和王介甫作》说,“虽能杀画工,于事竟何益?耳目所及尚如此,万里安能制夷狄?”王安石笔下的《明妃曲》还有流传天下的名句,“意态由来画不成,当时枉杀毛延寿”。到了明代依然有人以此为诗,明代魏儒在《王昭君》中说,“画工误妾何足算,世有妨贤病国人。”范兆祥在《昭君怨》中发出“金钿换取龙泉剑,寄与君王斩画工”的呐喊。

这个被万众憎恶的“皇家权威大画家”毛延寿并不见于正史,应该说只是一个古代文学形象,后世逐渐成为元代戏曲及现当代影视中的艺术形象。经过舞台、影像途径的传播,进一步强化了观众对毛延寿认识的固化,使之成为一个反面典型。

在著名的元杂剧《破幽梦孤雁汉宫秋》(即《汉宫秋》)中,马致远对王昭君出塞故事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:西汉衰弱,元帝受匈奴威胁,奸臣毛延寿投敌献美人图,匈奴发兵索取妃子王昭君。临行,昭君在灞桥留下汉家衣服,行至汉匈边界纵身投江而死。在马致远的笔下,待诏王嫱身份转化为妃子,画师毛延寿成为官员中大

夫并且反叛外逃,匈奴则以军事挟索取王昭君,最终酿成昭君身死的悲剧。

关于毛延寿的人生结局,《西京杂记·画工弃市》也有描述。当匈奴呼韩邪单于求亲时,昭君站出来毅然要去和亲。此时汉元帝第一次见到了昭君,虽然内心十分后悔把一个举止优雅、貌似天仙的宫女拱手送给匈奴,但是君无戏言,只能忍痛割爱送昭君前去和亲。于是毛延寿的劣迹败露,获欺君之罪被处死。

在马致远的《汉宫秋》中,毛延寿则被斩首以祭奠王昭君。官至中大夫的毛延寿叛逃到匈奴后,将王昭君的画像献给呼韩邪单于,让他向汉元帝索要昭君为妻。昭君为西汉百姓免刀兵之灾而自愿前往,元帝忍痛送行。单于得到昭君后大喜,率兵北去,昭君行至汉番交界时投水而死。单于为避免汉朝问责,便将毛延寿送还汉朝。汉元帝夜间梦见昭君而惊醒,又听到孤雁哀鸣,伤痛不已,后将毛延寿斩首以祭奠昭君。

经过历代文人的艺术加工,读者和观众大多对毛延寿恨得咬牙切齿。虽然宋代王安石为毛延寿鸣不平,“归来却怪丹青手,入眼平生几未有”,但是千百年来人们坚信毛延寿是“丑化”王昭君的元凶,他应该承担受贿和制造悲剧的后果。至今,京剧里依然有“骂一声毛延寿卖国奸臣”“你不该投番邦丧尽了良心”等唱词。这些唱词让观众获得艺术欣赏的愉悦,也觉得毛延寿被杀大快人心。

在昭君出塞的艺术创造与传播的过程中,王昭君成为了一个敢于为国家和民族奉献的女性典型,毛延寿则塑造成了一个罪有应得被处死的奸臣。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,读者和观众逐渐忘却了历史记载和艺术叙事的分野,很多人以为毛延寿确有其人,而事实上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史书中并不见此人。

昭君出塞已经远去了两千多年,有人视其为一场关于牺牲的悲剧,有人判断其为历史上一次决定性的外交事件。我们不必过分夸大王昭君的个人历史作用,但是要承认她的选择创造了民族和亲史上的标志性成果,促进了汉匈和平,推动了经济、文化交流融合。《后汉书·匈奴传》记载,汉匈和亲带来了“边城宴闭,牛马布野,三世无犬吠之警,黎庶亡干戈之役”的和平岁月。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说,“汉武雄图载史册,长城万里便烽烟。何如一曲琵琶好,鸣镝无声五十年。”董必武诗曰,“昭君自有千秋在,胡汉和亲识见高。词客各抒胸臆懣,舞文弄墨总徒劳。”周恩来赞美王昭君是“为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有贡献的人物”。

从历史的角度看,不仅史书不见毛延寿,而且汉代皇室画工一职也待证实。从艺术的角度看,毛延寿形象的塑造倒是衬托了王昭君,让这个女性人物形象更加丰满,让昭君出塞故事更吸引眼球、更便于传播。

久违的刑警“生图”



电视剧《我是刑警》播出期间收视率走高,在岁末年尾好剧扎堆的情况下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和话题度。多年来,警察与罪犯的较量在银幕与荧屏上重复无数,观众为什么还这么喜欢这部剧呢?简单点回答,无他,唯新尔。

《我是刑警》新在哪里?它不是一部近年多见的常规类型化的刑侦剧,尽管它也有刑警与罪犯的直接交锋,但这不是其主要的表达方向。剧中讲了西山矿抢劫杀人案、张克寒持枪杀人案、赌场爆炸案、李田碎尸案、良城连环杀人案等等,林林总总十几个大小案件,观众可以直观感受到,有的案件展开了侦破全过程,有的案件几乎是一带而过,但是所有案件都有一个贯穿情节,就是排查,显然,此处可划重点。

排查只是一个刑侦手段,但是此剧中的排查,可谓是大开眼界。刑侦总队调动了各方力量,包括刑警、民警、民兵、预备役、警校学生甚至部队战士开展会战式排查,失败一次后再做一次,打通条块分割、地域局限,做整体协调与整合。

数百人走访排查;近千人划片搜索排查;几千人挖地三尺排查;全国范围内指纹比对排查;动员所有力量找证物补足证据链等不计成本的会战式排查……不一而足。通过排查,刑警之间的代际传承、刑警的坚定信念、公安系统对于陈案积案侦破的坚决态度,还有指纹比对、大数据分

析、DNA比对、心理测试以及对于摄像头资料采集等技术,都一一展示。

剧集通过秦川这个人物带出了刑警系统自上而下的整体变革。秦川是剧中的灵魂人物,但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他继承了武英德、曹忠恕等老一辈刑侦专家的传统侦查技术,发展了自己的推断体系,也吸收了大数据、DNA等现代科技手段,使之做判断时,看似云淡风轻,但是每一个判断,都有着严密的推导依据和几乎无懈可击的严谨逻辑,令人心服口服。

剧中展现了基层刑警常年为了排查四处奔走,像是在森林里找一粒草籽,但每天都觉得“就是临门一脚了”,他们每天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煎熬,这是刑警的宿命,也是使命。

《我是刑警》不满足于一个刑警队或者某个刑警智勇双全的传统叙事方法,而是立足于全面展示整个刑警系统不惜成本打击犯罪的过程,以高度还原的手法将大案要案进行了展示,塑造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刑警形象。

剧中描述的大场面排查过程,强化了刑警“命案必破”的信仰,同时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巨大声势,体现出打击犯罪的磅礴力量。这种力量可以起到震慑犯罪的强大作用,可以让人民安心,让犯罪分子胆寒,这正是建设平安中国的强力保障。

据央视剧评

保留经典本色是改编的前提



日前,《红楼梦之金玉良缘》《白蛇:浮生》《落凡尘》《金庸武侠世界》等多部经典改编影视作品陆续上线,引发大众对经典改编话题的关注。

所谓经典,就是那些经历岁月淘洗始终闪烁着艺术光芒,并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、具有原创性和划时代意义的作品。由于自带观众流量,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和符号价值,经典可谓天然的IP富矿。由其改编的影视作品总能未播先火,激发大众的观赏期待。

然而,靠经典效应激发起大众的关注后,要让他们对新改编的作品看进去、喜欢上,将好口碑传播出去,并不容易。当一部经典改编影视剧上线后,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公众对既往各种改编版本孰优孰劣的讨论,成为一个媒介事件和文化现象。因此,如何从众多改编作品中脱颖而出,成为符合当下观众审美取向和观赏期待的“这一个”,是经典改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。

在投入改编创作之前,创作者都会关注经典改编的两组关系。一组关系是改编与原作的关系。经典的影视改编大多是从文学到影视的跨媒介创作。所以,在改编之前首先应研判经典的“可改编性”。有的经典故事框架明晰,细节刻画充分,人物丰满立体,文字文本特征和视听文本特征之间的差异性较小,适合进行影视语言转化,所以改编难度小。而有的经典强调作者的主观性表达,注重微妙心理的描写和象征方法的运用,重视叙述角度的变化,而使故事的连贯性、情节的戏剧性、人物的立体性有所弱化。这种情况在改编时具有相当难度。

另一组关系是改编和社会语境的关系。由于经典广为流传,每个人对其已形成某种固定认知,在观赏之前,也已有一

定的价值理念、情感积淀等。这些都属于观众的“前理解”。而所有人的“前理解”汇聚在一起,会深刻影响作品所处的社会语境,对影视改编作品的观赏传播产生重要的影响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,我们在经典影视改编中,应对所要改编的内容辩证分析、认真探究,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。一般说来,创作手法有移植式、注释式、近似式等。所谓移植式,就是最大限度还原原作,保留原著的基本人物体系、叙事逻辑、主体情节乃至价值内核,探索具有恒久意义的人生话题,提炼出具有恒久价值的人生哲理。

注释式是在还原原作的基础上,对某个人物或线索进行改编。近似式只从原作中吸收一些素材进行创作。这两种手法需创作者挖掘经典中不断生长的文化基因,与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结合,生出更富有时代感的内容。小说《红楼梦》描绘贾宝玉、林黛玉、薛宝钗等人物的生活和命运。而电影《红楼梦之金玉良缘》主要讲述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。这就是注释式手法的应用。电视剧《繁花》则保留原著小说的很多特质。比如,该剧具有与小说相似的故事脉络和人物设置,还时隐时现着小说渲染的那种感伤怀旧的时代氛围。但电视剧和小说之间又存在着很大差异。尤其是故事的设定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这就属于近似式创作的范畴。

可见,好的经典改编不是毫无创新的复制粘贴,也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全新作,而是站在经典的巨人肩膀上,用时代的眼光发现提炼原作中的美好,审视弥补其中的缺憾,启发广大观众通过作品思考人生、观察社会,从而获得熟悉又新鲜、隽永而独特的审美体验。据“学习强国”平台

